

# 眼科·盲校·西医东渐

方益昉

纵观华夏历史，从医学界到皇侯家，一贯缺少对盲人，特别是青少年盲视群体的技术和人性关爱，直到来华传教医生介入，现代文明手段才真正为盲人、特别是青少年失明人群点亮心灵光明。而从医学史出发，挖掘眼科在华行医，继而救助盲人的史料，其学术价值在于从被刻意模糊的形而上视角，找回中国的盲文教育启动机制。

“如果我能看得见/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……/眼前的黑不是黑/你说的白是什么白/人们说的天空蓝/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/我望向你的脸/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/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/忘了掀开。”萧煌奇原创《你是我眼》，自心底发出盲人歌手对光明的渴望，也触及明眼人最柔软的真情，面对盲人的伤痛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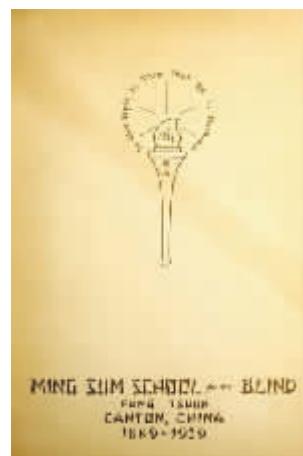
自古以来，不乏有心人讨论眼疾诊治技术。但是，直到来华传教医生介入，现代文明手段才真正为盲人、特别是青少年失明人群，点亮心灵光明。这段西医东渐插曲，过去因种种原因被视为宗教鸦片麻醉民众，其积极作用被视而不见。

1889年，广州芳村率先设置我国现代教育体制下的盲人学校，即明心盲人女子书院(Ming Sun School Blind Girls)，又名明心盲人书院(Ming Sun School for the Blind)。在此之前，西方传教机构对残疾弱势人群的技术救助已经开始，其中包括1887年创办的山东登州启喑学馆，即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，成为现代残疾救助事业逐步启动的标记。

19世纪后期的清朝，现代化曙光初现，不再万马齐喑。王清福旅美从政呼吁华裔美国人法律地位；广州芳村长大的伍廷芳，成为第一个获得伦敦林肯法学院博士学位的国人；成批的广东籍后生，构成容闳率领的旅美留学幼童团主力。

至于现代医学人才的萌芽，在清代洋务史上历史更久远。广州青年关韬(Kwang Ato)率先弃科举学西医。1850年代起，黄宽(Wong Fun)、何启(Ho Kai)、金韵梅(May King Kin)先后获英美医学学位，而纽约女子医学院MD/PHD双料博士金韵梅，恰是明心书院创始人的正牌学妹。(参拙文，刊《文汇笔会》2017年11月18日，《知识分子》2016年6月27日，《赛先生》2017年2月6日)

1885年，王韬小结西洋技艺，可算作学人的认知进步。“西人穷其技巧，造器之用，测



广州明心盲人书院 50 周年

天之高，度地之远，辨山冈，区水土，舟车之行，蹑电追风，水火之力，绝幽险，信音之速，瞬息千里，化学之精，顷刻万变，几乎神工鬼斧，不可思议。坐而言者，可以起而行，利民生，裨国是，乃其荦荦大者。”  
（《淞隐漫录》自序）

也就是说，1880年代晚期西学气候渐成，引进落实现代残疾救助理念，即临床诊治与技能训练并行，有社会基础。美国长老会梅理士夫妇(Charles Rogers Mills)来华传教34年，启喑学馆首先尝试特殊教育。梅夫人曾在纽约训练聋人手语，她将现代标音运用在学馆，该校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，设计的手语字母表，无疑是是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。

2年后，旨在盲人救助的明心书院，由积累了50余年在华行医经验的博济医院，以及新潮的葛夏女子医学堂，给予技术上、经济上的扶植和资助，明心书院的残疾救助能力大大超出启喑学馆。1939年，明心创办50周年时，落实了“为黑暗中枯坐之辈点燃光明”的校训。

## 传统医学对盲人缺乏有效关爱

纵观华夏历史，从医学界到皇侯家，一贯缺少对盲人，特别是青少年盲视群体的技术和人性关爱。传统医学的眼科论述，主要针对成人和老年病症。

对先天性、遗传性和外伤性儿童失明患者的病理、心理和人生辅导，几乎不置一词。对女性儿童的生命尊严，更是置若罔闻。科学与人文精神，在传统华夏医学中的缺位，此谓一例。

简而言之，华夏传统眼疾诊治基于五行学说，参合全身脉症，但在急性流行性眼疾爆发时，整体入手的慢郎中诊治观，无疑隔靴，实效有限。自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强调生食五辛、夜读细书等因素，容易导致眼病，对功能性光学生理退化的预防，开始有所涉及。

“宜用金篦决，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”，应属中医古籍最早、最有价值的白内障治疗记载，且为华夏医家与古印度等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。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集历代名家论说，包括金针拨内障以及钩、割、镰、洗等技艺。从此，除了内治的经络调理，外治也实施起来，直接引入熏、洗、点、拨以及针灸、按摩等技术手段。

作为眼疾治疗器具，有必要重点谈谈老花镜。宋元时期，眼镜传入中国，称为“叆叇”。明初，艺衡的《留青日札摘抄》和屠隆的《文房器具笺》均记载，助老人“目力昏倦，不辨细书”。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解，“空空格，眼镜也”。《南都繁会图景物图》的集市上出现“眼镜哥”，竟成科学史研究依据。石云里教授据此探讨帝王政治意识，乾隆爷一生拒绝使用眼镜，旨在

不受外物限制，却又念念不忘（《科学春秋》2016/7/25，转载《灵台秘苑》）。

“器有眼镜者，用助目昏备。或以水晶成，或以玻璃制。玻璃云害眼，水晶则无弊。水晶贵难得，玻璃贱易致。老年所必须，佩察秋毫细。然我厌其为，至今未一试。挥毫抚笺际，原可蝇头字。抑更有进焉，絜矩具精义。赖彼作斯明，斯明已有蔽。敬告后来人，吾言宜深思。”乾隆自老眼昏花起抗拒眼镜，“眼镜不见古，来自洋船径。胜国一二见，今则其风盛。玻璃者过燥，水晶温其性。目或昏花者，戴之藉明映。长年人实资，翻书棐几凭。今四五十人，何亦用斯竟。一用不可舍，舍则如瞽定。我兹逮古稀，从弗此物凭。虽艰悉蝇头，原可读论孟。观袖珍逊昔，然斯亦何病？絜矩悟明四，勿倒太阿柄。”

到了78岁，皇上已无法写蝇头小楷：“眼镜有二种，水晶与玻璃。玻璃价实廉，水晶货居奇。水晶虽艰致，用之无害滋。玻璃出冶炼，薰蒸火气贻。长年目力衰，视物或可资。今率五旬用，何异同佩觿。予古稀有八，依然弗用斯。蝇头虽难工，豆颗恒书之。以小可喻大，常理非奇思。藉已明于他，其道乖君师。”88岁去世前不久，乾隆对纠结一生的眼镜情缘做了结：“古稀过十还增八，眼镜人人献百方。借物为明非善策，蝇头弗见究何妨。”

翰林院中有阮元者，以眼镜拍马屁竟得赏识。“高宗寿八旬，目无叆叇照。臣赋眼镜诗，褒许得优诏。”乾隆热衷眼镜却病态长存，本质是拒绝新技术。

## 西医从诊治眼病入手引导信众

1834年10月26日，美国长老会派遣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·派克(Peter Parker)，清代通事旧译“伯驾医生”者，远赴广州医学传教。历经一年折腾，伯驾在十三行猪巷(Hog Lane)3号，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(Fung-tae Hong, San-taulan Street)升匾、开业。此事被学界标记为传教医生入华执业的源头(《博医会杂志》1909年5月号)。

1835年11月4日，“眼科医局”(又称新豆栏医局)开张，“一共来了4个求诊者。一位是双眼全瞎的女性，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，但伯驾不忍告诉患者，恢复视力机会渺茫，声称会竭尽全力治疗。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症患者，第4位患者双眼翼状胬肉，伴右侧上眼睑内翻”(Edward V. Gulick: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, 1973)

(下转11版) ➤



►作者收藏的明代纸框折叠式挂耳镜

◀《南都繁会图景物图》(局部)仇英  
(1494—1552)

